第47卷 第4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47, No. 4
2010年7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10

文学研究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

——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尚永亮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时至清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讽谕诗受到重视,获得了持续走高的道德评价,由此反映出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而在对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的品评上,多数评家持白优元劣、张优王劣的意见。相比之下,白优于元,不只是艺术水准上的领先,更在于道德品格上的优胜;王劣于张,固然与其诗不及张诗的深秀古质、清丽深婉、浅隽多趣有关,但也缘于清代评家对所谓"浅俗"的偏见。此外,对元白诗派之特点尤其是同中之异,清人也有了较前人深入的认知和把握。至于张、王二人在创作中与元白诗风的离合变异,则尚留下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关键词:乐府讽谕诗;元白张王;价值评判;优劣异同;清代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4-0058-09

中唐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之被称为元白诗派,固然缘于他们之间有着较密切的交谊,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其皆致力于乐府讽谕诗的创作。大概正是基于此一认知,历代论者涉及元白诗派时多以乐府讽谕诗为主要话题,而谈到中唐乐府诗作也很少会绕过元白诗派。考察清人对元白诗派乐府讽谕诗之接受,有两大现象值得关注:其一,除少数人对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讽谕诗过于直露、缺少含蓄提出批评外,多数论者都从诗歌社会政治功用和诗人道德品格角度,给予这些作品以高度称许,由此表现出一种浓郁的道德旨趣和现实关怀。其二,善于借助比较法,对齐名并称的诗人诗作从不同角度加以比照,既辨析其特点,又评说其优劣;而"元白"、"张王"两个组别内部及相互间的异同高下,自然也就成了论者关注的焦点。下面,笔者试从这两个方面对清人的相关论述作一大致的梳理和检讨。

一、以白居易讽谕诗为中心的道德评价

白居易是元白诗派的领军人物,故在各时期的接受视野中,他都处于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又由于其诗被宋人苏轼以一"俗"字总括,故常常受到后世论者的訾议。既为人关注又多受批评,大致形成北宋至明末白诗接受史的一个特点。

清初评家倡典雅、神韵而力斥浅俗,必然导致对白诗较多否定性的评价,其中尤以王士祯(1634—1711)为突出。王氏不喜杜甫、白居易诗,所编《唐贤三昧集》干脆将杜、白等人排除在外,并一再加以贬抑。不过,在论及元白等人乐府诗时,王氏则表现出宽容的一面,曾向人口述道:"唐人乐府,惟有太白《蜀道难》、《乌夜啼》,子美《无家别》、《垂老别》,以及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①其《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其九云:"草堂乐府擅惊奇,杜老哀时托兴微。元白张

收稿日期:2009-12-30

作者简介:尚永亮,男,河南长垣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 王渔洋口授,何世璟述:《然灯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页。

② 王士祯:《带经堂集》,卷十四,清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

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豨。"②"妃豨"者,发声词也,汉乐府《有所思》有"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之句。这里,诗人借"妃豨"代指古乐府,认为元白张王之"新"乐府虽未模仿古乐府,但却得其"古"意,从而表现出与杜甫乐府相同的"哀时托兴"的特点。

与王士祯同时稍后,还有一批论者就元白诸人的乐府讽谕之作发表意见,大都是肯定性的评价。如贺贻孙(1605? —1686?)指出:"白乐天自爱其讽喻诗,言激而意质。……指点色禽之荒,婉切痛快,字字炯戒。"①叶燮(1627—1703)一方面批评白诗浅切易厌,一方面举其《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赞其"言浅而深,意微而显,此风人之能事也"②。贺裳(约 1681 年前后在世)则以白诗《司天台》、《缚戎人》、《杜陵叟》、《卖炭翁》、《陵园妾》诸诗为例,称道其"不惟悉一时蠹弊,兼可作后世之前车"③。田雯(1635—1704)认为:"香山讽喻诗乃乐府之变,《上阳白发人》等篇,读之心目豁朗,悠然有余味。"④赵执信(1662—1744)在批评王士祯"薄乐天"之言行后指出:"乐天《秦中吟》、《新乐府》而可薄,是绝《小雅》也。"并谓白诗及张王乐府具"优柔舒缓之调,读之可歌可泣,感人弥深"。⑤ 沈德潜(1673—1769)对元白诗派整体评价不高,但谈及白氏《讽喻》一卷时,却称其"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人之遗意也"⑥。当他重订《唐诗别裁集》时,特意增补了白傅讽谕、张王乐府诸家诗,认为"乐天忠君爱国,遇事讬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⑦

总观上述评说,或曰"风人之能事",或曰"后世之前车",评价不可谓不高。然而,从本质上看,这些评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都在于道德教化和政治功用,其中虽有涉及诗风、用笔、章法等艺术层面者,但相比之下,不过是前者的附庸而已。

清中前期更值得重视的,是乾隆十五年(1750)由清高宗敕编的大型选本《御选唐宋诗醇》的问世。细览《唐宋诗醇》卷十九之白诗总评,首先概述白诗数量之多、传播之远、诗名之盛,接着就白氏人品展开议论,谓其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落实在创作中,便是:"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变杜甫之雄浑苍劲而为流丽安详,不袭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这就是说,白诗既远承《诗》之六义,又不失温厚和平,既变杜诗之貌,又得杜诗神味,则其可褒可奖,自在情理之中。

《御选唐宋诗醇》共选唐宋六家诗,其中唐四家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两家为苏轼、陆游。其《凡例》解释原因说:"兹独取六家者,谓惟此足称大家也。大家与名家,犹大将与名将,其体段正自不同。李杜一时瑜亮,固千古稀有;若唐之配白者有元,宋之继苏者有黄,在当日亦几角立争雄。而百世论定,则微之有浮华而无忠爱,鲁直多生涩而少浑成,其视白、苏较逊。……然则骚坛之大将旗鼓,舍此何适矣。"⑧稍后,四库馆臣又为该书作《提要》,谓其"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矣"⑨。由此,白居易诗获得了与韩愈并列、上跻李杜的地位,达至自宋以来最高的评价。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白氏的"忠爱"品行及诗中表现的"六义之旨"可以作为诗人创作之典范。

由于《御选唐宋诗醇》是以帝王意志和国家行为对唐宋诗学作出的价值评判,是对纷纭众说予以整齐划一的规范性论定,所以在当时和后世

---

① 贺贻孙:《诗筏》,《清诗话续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6 页。
② 叶燮:《原诗》,卷四《外篇下》,《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4 页。
③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清诗话续编》(上),第 359 页。
④ 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二,《清诗话续编》(上),第 700 页。
⑤ 赵执信:《谈龙录》,《清诗话》,第 313、315 页。
⑥ 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第 538 页。
⑦ 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5 页。
⑧ 爱新觉罗·弘历敕编:《唐宋诗醇·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永瑢等:《御选唐宋诗醇》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下)卷一九〇,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728 页。

均具有远超一般选本的影响。而此一时期的多数诗评家,亦莫不顺风承旨,对白氏讽谕之作不吝赞词。李调元(1734—1803)评白居易《新乐府》曰:"夭矫变化,用笔不测,而起承转收井然。其规讽劝戒,直是理学中古文,不可作词章读。"①陆继辂(1772—1834)则认为:"香山《贺雨》诸篇,命意源《三百篇》,体格本古乐府,人所共知。尤当师其文从字顺,无一句一韵不如天施地生。"②与李、陆两位对白诗已是很高了的评价相比,生活于嘉、道年间的诗评家潘德舆(1785—1839)在程度上变本加厉,更趋极端。

潘氏论诗以孔子诗教为标准,以《三百篇》为旨归,极力倡言温柔敦厚、思无邪等诗学传统,将厚人伦、敦教化作为现实目的。其矛头所向,首先是活跃于乾隆年间的性灵诗派,而对与其诗旨不合的其他诸家言论,亦严加斥责。具体到对元白诗派的评价,则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对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他认为有伤风化的歌行长篇,屡予排诋,视为"平衍寡情"之"猥亵语";另一方面,对白氏上承《诗经》比兴传统的讽谕之作,则击节称赏,推为"宇宙间必不可少文字"。在《养一斋诗话》中,这样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常常交杂混合在一起:

> 王若虚谓"乐天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甚矣若虚之识量易盈也!乐天惟乐府曲中人心,历劫不朽。谓其他诗皆随物赋形,侔于元气,是老杜所不能篇篇尽然者,乐天能之乎?……夫乐天长篇之病,正坐语语顺惬,无一笔作逆势,以致平衍寡情,岂可转目为擅长之地也!
>
> 魏泰谓"张籍、白居易乐府,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嘻!何其大而无当也。文昌乐府,古质深挚,其才下于李、杜一等,此外更无人到。乐天乐府,则天弦自解,独往独来,讽谕痛切,可以动百世之人心,虽孔子复出删诗,亦不能废。予尝谓其命意直以《三百篇》自居,为宇宙间必不可少文字;若《长恨歌》、《琵琶行》,则不作可也。③

上引两段文字,一在驳斥王若虚对白氏长篇之赞扬,一在驳斥魏泰对白氏乐府之批评;前者重在说明白氏歌行长篇"顺适惬当,句句如一"之不足道,后者重在说明张、白乐府"古质深挚"、"讽谕痛切"之可珍贵;肯定后者,意在否定前者;而对前者的指斥,正是为了对后者的张扬。在潘氏看来,诗不能徒作,而须有益世道人心。倘若符合此一本旨,即使"时伤浅率",亦"足以扶人识力,养人性天",如白居易之《重赋》、《伤友》、《不致仕》、《卖花》诸诗,皆"劲直沉痛","若概以浅率目之,则谬矣。"由此更进一步,潘氏摘引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之"为诗意如何,六艺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诸语,视之为"诗学圭臬",并明确声言:

> 予欲取之以为历代诗人总序,合乎此则为诗,不合乎此,则虽思致精刻,词语隽妙,彩色陆离,声调和美,均不足以为诗也。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④

此一观点,已将白氏诗论及其讽谕诸作推向极致,将诗歌的道德、教化目的推向极致;与之相伴,潘氏的诗学旨趣和审美标准也越来越狭小、极端,越来越偏离了诗的艺术本质。当然,潘德舆并非不懂诗艺之人,一旦逸出道德范围,他对若干白诗的表现特点还是颇有独到之见的。但若与其以道德律令论白氏乐府相比,毕竟不占主导地位。

类似潘德舆这种趋于极端的诗学思想,虽然在清代评家中并不普遍,却颇具代表性。它反映了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这种情形,在晚清刘熙载(1813—1881)的评说文字中亦有一定程度的显现。刘氏《艺概·诗概》论及元白诸人诗时,一再强调诗与道、诗与人的关联。如谓:"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余谓诗莫贵于知道,观香

① 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清诗话续编》(下),第1531页。
② 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卷十一,清光绪四年兴国州署刻本。
③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四,《清诗话续编》(下),第2036、2057页。
④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十,《清诗话续编》(下),第2166—2167页。

山之言，可见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①在刘氏看来，白居易的讽谕诗之所以可贵，即在于其诗以贯道，其人“或出或处，道无不在”。由于“道”在心中，故其创作才可“代匹夫匹妇语”，“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由此出发，审视向被视为浅俗的白诗，结论自然有别：“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②这既是深得创作甘苦的艺术评论，也未尝不是由白诗载道所得出的逻辑归纳。也就是说，因白氏志在兼济，故最能体恤百姓饥寒劳困之苦，而这些苦困只有以常语才能予以真切展示，达到惊动人心的效果。所谓“用常得奇”，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对元白诗派乐府讽谕诗的评说，至清后期渐趋减少。其因盖在道光、咸丰年间，诗坛发起了由尊唐而崇宋的宋诗运动；此后，清末民初又崛起了盛行一时的同光体诗派，其诗学重心转向对宋诗的效法。尽管陈衍、沈曾植所谓“三元”、“三关”之论，元和皆在其中，但他们于元和一期特重韩愈，其意在于通过韩愈上溯杜甫，又由杜、韩而返归元祐之黄、陈诸家，由此构成诗歌发展史的核心链条。元白诗派诸人因不在此链条之中轴线上，自然易受忽视甚至诋诃。如曾被陈衍称为“同光体之魁杰”的沈曾植（1850—1922），虽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声言“夙喜张文昌乐府”，但对白居易诗却颇致不满：“漫守张为主客图，旁行斜上破功夫。白家广大元无教，得似韩门变态无？”③认为张为《诗人主客图》中的说法不宜轻信，若比起韩愈的变化创新，白居易的所谓“广大教化主”只算是“旁行斜上”，原不须费力去学的。

此一时期，能跳出同光体藩篱之外而别有主张的，可以张之洞（1837—1909）为代表。张氏论诗兼取唐宋，但于宋最不喜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于唐则力推白居易的讽谕之作。其《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云：“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其《读史绝句二十一首·白居易》云：“海图题咏见忧思，浪搅天吴悔已迟。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④两首诗中，一则曰“泪洒香山讽谕诗”，一则曰“千秋独诵白家诗”，可见其对白诗特别是其讽谕诗濡染之深、推赏之甚。“读书叹微管，适野忧其戎。能严内外辞，方有膺惩功。吾闻白太傅，华声讽乐工。”⑤注重白诗中的忧民内容和惩劝功能，突出诗歌以诚感人的特质，既是张之洞倾心白诗的重要原因，也是前述清代评家重道德教化诗学观的一种自然延续。

二、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

在元白诗派四位主要成员中，依其交往之疏密、诗风之异同、创新意识和创作成就之大小，后世评家多将之分为两个组别：白居易、元稹为一组，张籍、王建为一组，由此形成“元白”、“张王”两个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固定化称谓。清人沿袭此一称谓，除对白居易所代表的乐府讽谕诗作出如前所述若干道德评价外，还围绕元白张王之创作特点和优劣高下，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比较评说。

（一）白元优劣之道德艺文的双重审定

元、白二人，并称已久，然无论在道德品格上，还是在创作成就上，元均不如白，几成历代评家共识。与之相承，清人凡论元白二人文字，也多着眼于道德与艺文两个方面，褒白而贬元。前引《御选唐宋诗醇》所谓“微之有浮华而无忠爱”、其视白“较逊”⑥的说法，即是颇具代表性的意见。由此引申开去，即使论及诗风诗品，论者们也多持白

①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4—65页。
② 刘熙载：《艺概》，第65页。
③ 沈曾植：《答石遗》四首其四，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7页。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诗集》卷四，民国十七年刻张文襄公全集本。
⑤ 张之洞：《连珠诗》，《张文襄公诗集》卷三。
⑥ 爱新觉罗·弘历敕编：《唐宋诗醇·凡例》。

优元劣观。如牟愿相谓:"白乐天'俗'字固不可易,然以元微之并观,乐天定是不俗人。"①李调元在高度肯定了白居易《新乐府》之后指出:"元微之则宛然柔媚女郎诗矣。世称元、白,元何能如白也。"② 陈仅更就元白、温李、皮陆诸人进行比较说:"元、白齐名而元不如白,温、李齐名而温不如李,皮、陆齐名而皮不如陆,非独其诗之有优劣也。"③由此看来,在对白、元二人之高下优劣的评鉴上,清代论者的看法是颇为一致的。

当然,一些评家在总体上褒白贬元的同时,也意识到元白二人在诗歌创作上又是互有短长的。如清初叶燮在指出"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春容暇豫"后,认为"二人同时得盛名,必有其实,俱未可轻议也。"④贺裳进一步指出:

> 诗至元白,实又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苍莽中间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既由风气转移,亦自材质有限。⑤

从诗之选语、波澜、古调、新声诸方面辨析元白差异,并揭示时代风气与个人材质在其中所起作用,可谓颇得情实。

与贺裳相比,潘德舆对元稹素无好感,盖缘于其对元稹道德品行之不满。在《养一斋诗话》中,他多次严厉指斥元稹其人其诗,认为"元之诗品,又不逮白";但对元稹的某些诗篇,他却并未一笔抹煞:"《连昌宫词》收场用意,实胜《长恨歌》。艳《长恨》而亚《连昌》,不知诗之体统者也。'寂寞古行宫'二十字,足赅《连昌宫词》六百余字,尤为妙境。诗品至微之,犹非浪得名也。"⑥从"收场用意"肯定《连昌宫词》,从言简意远肯定《行宫》,并誉之为"妙境",表现出了潘氏的艺术眼光及其对元诗有限度的褒赏。尽管这里的"收场用意"云云不乏道德、诗教的因素,但其与艺术关合处却不无一定道理。

(二)张王优劣及其特点的多角度辨析

张、王向以乐府并称,是创作乐府诗的专业户,其诗作较之元白既别具风貌,又不存在像元稹那样由人品引起的纠葛,故二人孰优孰劣,有何特点,曾引发评家的持续兴趣和远较元白为复杂的争议。综观清人对张、王诗的评价,大致表现为三种意见:

其一,将张、王诗并置一处加以赞扬。如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高棅《品汇》设立名目,取舍不能尽当,惟七言古以张、王并列,极为有识。文昌善为哀婉之音,有娇弦玉指之致;仲初妙于不含蓄,亦自有晓钟残角之韵。"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王建、张籍乐府,何曾一字险怪,而读之人情人理,与汉、魏乐府并传。古人不朽者以此,所以诗最忌艰涩也。"

其二,对张、王诗的笼统批评。如毛先舒《诗辩坻》卷三:"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设色秾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中唐乐府,人称张、王,视此当有郎奴之隔耳。"沈德潜《说诗晬语》:"惟张文昌、王仲初乐府,专以口齿利便胜人,雅非贵品。"

其三,具体评说张、王诗之优劣,而其总的趋向是褒张贬王。如《诗辩坻》卷三:"籍、建并称,然建远不如籍。籍《楚妃》、《离宫》有盛唐之调,俱得乐府遗风。建《宫词》直落晚叶,去孟蜀花蕊夫人一间耳。夜看扬州市,何里巷也!"⑦《载酒园诗话又编》:"王之《当窗织》、《簇蚕词》、《去妇》、《老妇叹镜》、《促刺词》,若令出司业手,必当倍为可观。惟形容狞恶之态,则王胜于张。……

---

① 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清诗话续编》(上),第 919 页。
② 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清诗话续编》(下),第 1531 页。
③ 陈仅:《竹林答问》,《清诗话续编》(下),第 2254 页。
④ 叶燮:《原诗》卷四《外篇下》,《清诗话》,第 606、604 页。
⑤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清诗话续编》(上),第 360 页。
⑥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下),第 2047 页。
⑦ 毛先舒:《诗辩坻》卷三,《清诗话续编》(上),第 57 页。

司马律不能佳,排律尤劣,故昔人谓其俗。"①《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三·张司业集》:"籍以乐府鸣一时,其骨体实出王建上。后人概称张王,未为笃论。"②

以上三种意见,大都不是孤立地就张王论张王,而是将张王置于唐诗特别是中唐诗的创作背景中,借助张与王或他人间的相互比照,对其地位高下做出诠评。就褒扬而言,论者较看重的是张、王乐府对汉魏乐府的承接,是其清削真切、入乎情理,甚至王建诗的不含蓄,也成为肯定其诗"妙"的一个原因。就批评而言,论者主要聚焦于张王乐府的品格,或谓其未得古乐府遗法,或谓其过于浅俗而雅非贵品。当然,这类较为笼统的批评在整个评论数量中所占比例不大,而且批评者在别一场合也还发表过肯定性的意见。就张王诗之优劣而言,论者看重张籍的,主要是其俗而能雅,气骨充盈,而王建诗与之相比,未免过于浅俗鄙俚,体气卑弱。

具体来说,张籍诗的特点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深秀古质,发音苍远。《诗筏》:"张司业籍以乐府古风合为一体,深秀古质,独成一家,自是中唐七言古别调。"《三唐诗品》卷二:"其发音苍远,质胜于王。"

清丽深婉,称情而出。《石园诗话》卷二:"文昌五言不乏清丽深婉之句,不独平淡可爱也。"其《离妇》、《赠孟郊》、《行路难》、《寄李司空》诸诗"皆清丽深婉,称情而出。"

浅隽多趣,不失工妙。《诗辨坻》卷三:"张籍《节妇吟》,亦浅亦隽;《吴宫怨》无中生有,得青莲之遗。馀作亦有工妙。"《养一斋诗话》卷三:"文昌七律或嫌平易,五律清妙处不亚王、孟,乃愧梦得、牧之、义山哉!"《问花楼诗话》卷一:"文昌拟乐府诸诗,绰有妙绪。"《方南堂先生辍锻录》:"张文昌乐府,急管繁弦而下不觉其局蹐者,趣胜也。"

张籍诗这几种特点,往往是掺杂交融在一起的,而长于情辞,不乏清丽和古质,乃是其核心所在,同时,也构成其诗异于王诗并高于王诗的主要原因。大概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生活在乾隆、嘉庆年间的李怀民撰著《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说》,在晚唐张为的基础上,将中晚唐诗人分为两派,一派以张籍为清真雅正主,一派以贾岛为清奇僻苦主。而在论述张籍时,李怀民明确指出其诗"天然明丽,不事雕镂,而气味近道;学之可以除躁妄,祛矫饰,出入风雅。"并谓其五言之作"体清韵远,意古神闲,与乐府词相为表里,得风骚之遗。"③据此可知,张籍诗受到了李怀民的特别重视,所得评价之高已远超同侪。当然,清代论者对张籍诗的弊病也是有着清楚认知的,即使在同一位论者那里,也往往表现出褒奖和批评两种态度。如《诗辨坻》卷三在肯定其"亦浅亦隽"的同时,即指出其诗"于结处正意悉出,虑人不知,露出卑手";《诗筏》在称赏其"深秀古质"之后亦谓:"可惜边幅稍狭耳"、"盖司业所病者节短";至《载酒园诗话又编》,更在论刘长卿时谓"其后遂流为张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踰于人我,无复高足阔步,包括宇宙,综揽人物之意。"凡此说明,张籍诗优劣相包、瑕瑜互见,但就总体情形言,又是瑕不掩瑜、优过于劣的。

与张籍所受到的"礼遇"相比,王建的境况要差出许多,不少评家对王诗表现出否定的态度。归纳其批评意见,主要是认为王诗佻浅卑俗,不入雅道。如《诗辨坻》卷三:"王建歌行,才思佻浅,便开《花间》一派,不待温、李诸公也。"《养一斋诗话》卷九:"然建诗惟乐府可贵,《宫词》已浮冗,律诗尤浅俚不入格。"《越缦堂读书记·文学》:"仲初宫词固佳,其它诗都有俗气,乐府最名于代,虽稍有工者,亦多失之质直。七律格韵尤卑下,乃开晚唐五季庸劣一派,可谓恶诗。中唐以后五律如姚秘监、王仲初等,皆极浅弱,稍于一二近景琐事,刻画取致,亦往往有工语。然道眼前景,每至取极俗极琐小极无意味者,乃堕打油钉铰恶道,仲初诗'小婢偷红纸'等类是也。"这里所说"佻浅",就是

①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清诗话续编》(上),第355—356页。

② 永瑢等:《张司业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下)卷一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90页。

③ 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退思轩藏板。

不够庄重;所说"浮冗",就是失于省净和严谨;所说"俗气"、"卑下",就是有悖雅道;至于谓为"恶诗"、"堕打油钉铰恶道"云云,其评语之严厉,更是远过前人。

然而,王建诗亦自有其特点和长处,若是贬抑过甚,便流于意气用事而失去了客观公正。因而,清代评家也颇有为王诗张目者。如《诗筏》即谓王建《宫词》"真深于怨者,不独'树头树底'一首也。"并通过比照指出:"花蕊盗王建语,然不及王建远甚。……王建'御厨不食索时新'七字,写女子性情娇痴厌饫之状如见。"①《载酒园诗话又编》谓"张咏猛虎,故摹写怯弱以见负嵎之威;王咏射虎,故曲尽狡狯之态。用意不同,俱为酷肖"。他如《石洲诗话》卷二谓王建《宫词》之妙,"则自在委曲深挚处,别有顿挫";《石园诗话》卷二称"王仲初乐府歌行,思远格幽"。这些意见,多集中于王建的《宫词》和乐府,较少顾及其他诗体。至《一瓢诗话》,则将视野放开,认为"王仲初长篇小律,俱有妙处,不可以宫词、乐府拘定其身价。"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说》进一步从《宫词》、七言古拓展到五七律,为王诗辨诬:"至谓司马律不能工,或病其俗。噫嘻!世所谓不俗者,吾知之矣,错采镂金,矫饰补假,以要博大精深之誉。……俗情入诗,直寻天妙,固是风雅之本。世惟认错俗字,并雅亦失之,而所谓不俗者乃真俗矣。按仲初律诗实与司业合调,第司业妙于清丽,司马偏于质厚,不无微分。……至其字清意远,工于匠物,则殊途同归也。尊为入室,良不诬矣。"这段文字,从一"俗"字展开议论,谓世人错认"俗"字,"并雅亦失之"。而就王诗言,虽更偏于"质厚",与张籍之"清丽"有所不同,但"其字清意远,工于匠物",却是与张"合调"、"同归"的。

(三)元白诗派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元白诗派四位成员虽各具特点,但又同多于异。而对其相同点的发现,也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早在晚唐时期,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将白居易列为"广大教化主",而将张籍列入以李益为代表的"清奇雅正主"门下,尚未将其视为白派诗人。到了北宋,情况发生变化,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率先指出:"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进一步认为:"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至此,元、白、张、王四人才被评家置于一处并称,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因素,便是其所作乐府诗及其共具的特点。当然,魏泰、张戒虽将四人并称,但对其乐府诗的评价却展示出两种倾向:一是谓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能"道得人心中事",一是谓其"言尽意尽,更无余味"、词气"浅近""卑弱"。前者是赞扬,后者是批评,而相比之下,赞扬远远抵不过批评的份量。宋人的这样一种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接受者,使他们在谈及元白诸人乐府诗时,大都沿袭此一路数,以"委曲周详"和"言尽意尽"为评定标尺,或褒或贬,概所雷同。一直到了清代中期,多数评家才如前文所述,开始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逐渐统一了意见,对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乐府诗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视之为"历劫不朽"、"可以动百世之人心"的佳作,是"风人之能事"和"理学中古文"。

然而,上述着力于发现相同点的做法虽有助于诗派性质的认定,却无益于对诗派成员不同特点的认知和深化;高度的道德评价虽将乐府诗提升到了一个令人嘱目的位置,却因缺少艺术层面的坚实支撑而稍显苍白乏力。大概正是意识到了这些情况,部分清代评家开始对中唐乐府诗的艺术特点和元、白、张、王的同中之异展开辨析,其间是丹非素,上下甲乙,虽不无杂乱处,但客观上却将考察的范围和深度作了不同程度的扩展推进。

在具体评说中,除前述元白及张王间的辨析外,有就白、张之异同辩说者:"白乐天歌行,平铺直叙而不嫌其拖踏者,气盛也;张文昌乐府,急管繁弦而不觉其局蹐者,趣胜也。"②有就白、王之优劣指陈者:"白傅……如此作宫怨诗,真数十百言不得尽矣,然犹愈于'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

① 贺贻孙:《诗筏》,《清诗话续编》(上),第177页。

② 方南堂:《方南堂先生辍锻录》,《清诗话续编》(下),第1939页。

不敢言'者。盖白诗止是一'浅'字；'含情'二语，求深而得纤，几于不成言语。学诗者循此为诗，心源中无一条正路矣。"①也有就白、张、王三人之艺术风格综论者："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②此外，还有一些意见，集中在对"元白"与"张王"两个组别之特点和差异的评说。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言："元、白、张、王并以乐府擅长，而元稹、白居易多作长调，以曲折尽情；张籍及建多作短章，以抑扬含意。同工异曲，各擅所长。"③一多长调，一多短章，或曲折尽情，或抑扬含意，此为元白与张王的显在区别。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指出："张、王已不规规于格律声音之似古矣，至元、白乃又伸缩抽换，至于不可思议，一层之外，又有一层。古人必无依样临摹，以为近古者也。"翁氏认为元白诗派之成就不在于摩古而在于创新，相比之下，元白的创新度更超过了张王；其短处则在于"太露太尽"，不够含蓄。管世铭进一步指出：

> 乐府古词，陈陈相因，易于取厌。张文昌、王仲初创为新制，文今意古，言浅讽深，颇合《三百篇》兴、观、群、怨之旨。白乐天尤工此体，至欲藉以感悟宸聪，敷陈民瘼，其积愈厚，故其言愈昌。特音节飘飘，乖于杜、韩正响，要亦天地间不可少之一种文字也。元微之骨色稍庸，择数篇自足相敌。至张、王尚有古音，元、白始全今调，则又可为知者道也。④

比照唐人乐府与古乐府，指出张、王、白诸人诗或曲折，或质古，然皆能"创为新制"，所谓"文今意古，言浅讽深"，是其突出特点。而相较之下，张王"有古音"，元白"全今调"，则是其主要差别。

三、余　论

以上，我们从两个方面对元白诗派乐府讽谕诗在清代的接受概况作了一个梳理，倘稍加总结，大致可以看出这样几个要点：

其一，时至清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讽谕诗受到重视，获得了持续走高的评价。

其二，清代接受者之所以对乐府讽谕诗予以高评，看重的主要是其内含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反映了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这种倾向，往好处说，是对强调美善一致的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其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的情愫；往坏处说，则因某些论者将诗歌的道德、教化目的推向极致，而使得其诗学旨趣和审美标准日趋狭小、极端，越来越偏离了诗的艺术本质。

其三，与前述道德评价不无关联，清代评家大都优白而劣元，表现出对元稹不屑的态度，以致一定程度地遮掩了元诗的艺术价值。

其四，在对张籍、王建的比较评说中，认为张优王劣，并从深秀古质、清丽深婉、浅隽多趣几个方面概括张诗的特点，见出清代评家日趋细密的鉴别能力；但对王诗过多的否定，则展示了清代评家对所谓"浅俗"的偏见。

其五，对元白诗派之特点尤其是元白与张王的同中之异，清人已有了较前人深入的认知和把握。但倘若联系到张、王二人在心性、诗风及其与主流诗坛之关联等情形，考察其与元白诗风的离合变异，又可以发现清代论者还存在若干未曾展开或深论的问题。

下面，试就这些问题，联系近今学者的相关意见，稍申述之。

首先，张、王诗具有一重主观一重客观之差异。就二人在当日诗坛之整体情形论，张籍心性通脱，长于交往，与韩愈、白居易都有很深的感情；王建一生辗转，沉沦下僚，与韩、白诸人虽有往还，但交谊不深。张因受韩派诗人诗风影响，故所作乐府主观色彩强，情感充溢，古质委婉，时具远韵；王与主流诗坛不无疏离，而对市井民间了解深细，故所作乐府更具客观性，长于描写，多用俗语，较近本色。

---

①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下），第2026—2027页。

② 刘熙载：《艺概》，第65页。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下），卷一五《别集类一·王司马集》，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00页。

④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清诗话续编》（下），第1547、1549页。

其次,就张、王诗与元白诗风之关联言,在远近疏密和体气性分上又呈现出复杂的情形。钱钟书论张籍有言:"张文昌《祭退之》诗云:'公文为时帅,我亦微有声;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是退之与文昌亦齐名矣。然张之才力,去韩甚远;……其风格亦与韩殊勿类,集中共元白唱酬为多。……盖虽出韩之门墙,实近白之坛坫。"又谓:"其诗自以乐府为冠,世拟之白乐天、王建,则似未当。文昌含蓄婉挚,长于感慨,兴之意为多;而白、王轻快本色,写实叙事,体则近乎赋也。"①尹占华论王建亦谓:"中唐影响最大的两大诗派是韩孟和元白,若将韩孟派看作是主观诗人,将元白派看作是客观诗人,那么张籍、王建在创作路线上都可以看作是元白一派中的人物,但张籍与元白离心的趋向较之王建要大一些,王建则比较更为恪守元白一派客观写实的创作路线。"②综合钱、尹二家意见,总而观之,张籍诗虽受韩派影响,但其声气形貌仍属元白一派;细而察之,张与白交谊深,诗风反离白远;王与白交谊浅,诗风反距白近。

最后,就张王乐府与元白新乐府之特点论,重写实、尚通俗,体察百姓疾苦,批判现实黑暗,是其共同趋向。其不同处在于,元白特别是白居易的新乐府立足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具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和讽谕意图,而张王乐府则更为随意自然,多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职是之故,前者多题旨显豁,用语直白,易于言尽意尽;后者则重在描写和叙情,多含蓄委婉,古质细密,发人深思。前者谋篇布局,意在笔先而系统周延,更具创新性和规模效应;后者因依传统,不事张扬而随感随发,稍欠集中度和冲击力。由此反观前述清人相关评说,其关注目光多集中于白居易所代表的讽谕之作,并给以高度的道德评价,大概也与白氏《秦中吟》、《新乐府》等作品更为突出的主体意识、讽谕精神和规模效应有一定的关联吧。

The Values Judgment of Yuefu Allegorical Poem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the Merits, Defects,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the Poems by Yuan Zhen, Bai Juyi, Zhang Ji and Wang Jian

Shang Yongli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Yuefu allegorical poems represented by Bai Juyi gained great attention and received high moral evaluation. Therefore, it showed that the theory on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returning to the orthodox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vention in reality. As for the evaluation of Yuan, Bai, Zhang and Wang, most critics agreed that Bai was better than Yuan, and Zhang better than Wang. In comparison, Bai was superior to Yuan not only in artistic standards, but also in morality. It is true that Wang's poems were not so delicate or elegant as Zhang's. It was due to the prejudice of some shallow and vulgar cri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Besides, the Qing critics had a deeper cognition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an and Bai. As regards the creative variability between Zhang with Wang, and Yuan with Bai,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Yuefu allegorical poem; Yuan Zhen, Bai Juyi, Zhang Ji and Wang Jian; values judgment; merits; defects;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accept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页。

② 尹占华:《论王建的诗(代前言)》,《王建诗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3页。